

January 1935

論所謂「秦式」銅器

Shixu ZH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鄭師許 (1935)。論所謂「秦式」銅器。《嶺南學報》，4(2)，7-27。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4/iss2/2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論所謂『秦式』銅器

鄭師許

一、本文的動機

在最近的一個月以前，我替交通大學的交大季刊第十五期作了前漢時代陸路交通考上篇，中間有一段文字這樣說道：

近人盛稱秦時與西域印度諸國已有交通。日人藤田豐八中國石刻之由來一文云：「中國在始皇以前，尙無石刻之風。……波斯此等刻石之文，蓋頌帝功德教訓臣民之意，始皇之刻石亦如此。……其間似係一脉相通」……雖然，藤田之說，尙爲推測之辭，未敢下一輕易之決斷。余嘗疑秦時與西域諸國或已有間接交通，與藤田所見同，然以無確實證據，未敢謬然判定。藤田氏始終不敢肯定言之，是也。至日人濱田耕作氏則不然，在其所著東亞文明之黎明中，有所謂秦式藝術者，謂：「秦原是西戎之國，在人種上，文化上，與西方蠻族有極深之關係者……」。並謂秦器中之變形雷紋，乃受西徐亞 (Scythian) 文化之影響。其言似若可信。惟最近安徽壽州出土楚器一大宗，其文字，形制，紋樣，與近二十年來數次發現之重要銅器若新鄭出土鄭器，洛陽出土韓器，歸化出土趙器，皆有連帶關係。近經北平考古學社劉節考訂，著爲楚器圖釋一書，徧舉東周以來銅器紋樣衍變之跡，證明所謂變形雷紋者，在吾國本土自有淵

源可尋，秦器之名，不攻自破矣。是秦時未嘗與西亞諸國直接交通也。藉口有之，亦為時甚暫，並不頻繁，故於文化方面，未受若何大影響也。

這文交卷以後，心胸中常縈思着這個問題，以為足以尋究我國與西方交通的原始情形，寒假中閒着無事，因發憤盡取近人所著金石學，考古學諸書，詳為檢閱，乃毅然決定所謂「秦式」銅器之說不能成立，當時東西文化尚未交流。現在擬捨棄交通一事和書傳傳說不談，專從實物方面，一一為之分別討論，作為一種新假設。

二、『秦式』銅器說的來源

關於「秦式」銅器說的來源，郭沫若在欒氏壺一文中，說得最為清楚，他說：

秦器之說，倡于法商王涅克氏 (L. Wannick)。原以民國十二年（西紀一九二三年）山西歸化城北百里許之李峪村有大批青銅器出土，大率為王氏所得。器形多奇狀，製作紋樣均與商器及周代較古之器有異，器薄而帶輕快味，文樣平面施於全身，多作虺龍文，間有鑲嵌及立體動物形之附飾。此等形制在古器中自為一式，自來著錄中本習見，特以多無銘文，未能判別其年代，舊不甚重視之，而多擬為漢器。歸化器有銘者僅二，一為戈，一為劍，劍見西崙氏著古代中國藝術史 (O. Siren: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第九十六圖 A，僅見其一面，臘末尙除止十子三字，與貞松堂集古遺文^{十二}_{二十}所錄「吉日壬午劍」末三字相同。……羅氏云：「往歲見之都肆，錯金成文」，與李峪劍蓋同時所鑄，並同時出土者也。李峪劍銘，說者均未

及，疑僅存三字，被認為花紋故。就此字體觀之，自當在周末，然王涅克氏據歸化土人言，認為秦始皇二十八年巡狩時所遺留之器，於是『秦器』之名遂譏於世。

此外濱田耕作的東亞文明之黎明，梅原末治的歐美ニ於ケル支那古鏡，及北支那發見ノ一種銅容器ト其ノ性質，劉節的壽縣所出楚器圖釋等書所說，與郭氏相同而較簡畧。然則所謂『秦式』銅器一說，是由法國古董商王涅克氏誤信歸化土人之言而捏造出來的謠言。

三、東方學人的解釋

王涅克氏造下了謠言以後，東方學人附和其說的便不在少數。據筆者所見，以日本考古學權威濱田耕作氏擁護為最力。他在東亞文明ノ黎明裏第七章說道：

至少周代底古典藝術崩潰了，到新的藝術產生為止，只有繼續墮落衰頹的狀態了。對於這過渡期，我們沒有給與特別的名稱的必要。如其要勉強給與，怕有不適的地方，叫作歐羅巴底學者們也在使用的所謂『秦式』也是一種方法罷。我們歷來是將它在周代之末附論，或攝入漢代處理的；近來，因得到稍稍豐富的資料，常常作為秦代底遺物而區別開了。……其主要的資料之一，是距今數年前，法國古董商王涅克在山西李峪村發見的二十餘點的銅器羣。……其器形，紋樣等，正是可認為周漢之間的秦代底東西。我幸於去年在巴黎得有參觀的機會，其大體的樣式，實是可以看作漢代的銅器的。而且其上面裝飾着的紋樣，是周代的變壞了的一種的變形雷紋的平板的表面裝飾，以前那樣的有凹凸的浮彫式的地方全然沒有

了。作為周漢間過渡期的東西，實是適當的。所以把它當作秦式也是絕不錯的。又自唱導了秦式這東西之後，歷來作為漢鏡底極古的形式的一種薄鏡上加以淺的變形雷電紋的一類，現在也有人把它當作秦鏡來處理了。無論如何，把它當作周漢之間的東西，這是無異論的。銅器中的樣式底分類，在這數年間也漸漸精密了，這是很可喜的。

又在同書第八章裏說道：

但這單是不承認商周時代底古典的東西中的斯基脫 (Scythian) 文化底影響，通過周末至漢代的北方民族的斯基脫，西伯利亞底藝術有及於中國底藝術底顯著的影響，這在我，也不躊躇地承認的。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從中國發見的帶鈎底裝飾，馬具底透彫裝飾等之中，看到必須看作斯基脫式的動物樣式，尤其是獸類底爭鬥或交錯着的紋樣之類；原來這些馬具、革帶等底使用，是由北方輸入中國、朝鮮的，所以隨伴着它的藝術樣式底移入，不僅是最自然的現象，其特殊的模樣底相互的一致，到底不能說是偶然的符合。

我們從這兩段話當中，可以看見濱田氏的態度底堅決了。其次在日本考古學界有一位新興的學者名叫長廣敏雄，主張「秦式」銅器之說，與濱田氏同一堅決。他在工藝史上ヨリ見タル環樣式ト銅鏡說道：

所謂秦銅器者，從秦鏡而言之者也。在歷史上有無秦代是別一問題，而在藝術史上，明其為中間式樣，自有存在之理由，可無容疑也。何以言之？在周式樣與漢式樣之間，其中有一式樣，即秦式樣，此種假定，可無問題也。蓋此種假定之秦式樣，從考古學精密考察之結果，與歷史上之秦代平行，漸得一般人之確認，此從研究上之

見地言之，固如此也。此秦式樣之確認，可為今後支那考古學或至支那古代藝術史之中心課題；然從其式樣之立場言之，可得如下之展望。第一：當思秦式樣者為周式樣之解體過程。即周式樣與秦式樣之大區別，周式樣為秩序 (cosmos) 的，而秦式樣則為無秩序的 (chaos) 也。從而秦式樣者，群雄割據的諸種要素比之統一的要素為重。第二：當思秦式樣與漢式樣之關係極為重大，所謂漢者，秦之純化而已。由是言之，周式樣者，與秦式樣對立者也。而秦式樣則與漢式樣同屬一體系者也。

又說：

所謂秦式樣者極有意味，而就秦鏡可以明之。今試手一面秦鏡，(如附圖一)為例。其鏡背之浮刻文樣與其地文樣之併合，自不得不首先注意也。……如此圖之秦鏡，合三個怪獸順次追逐以為圓帶者也。怪獸一一變其姿態，而三者同為S字形，有跳躍之氣。以足踏於鈕上為遠心之結構。此等怪獸形，其見於周器中之抽象的走獸形(如虺龍夔龍等)，漸漸棄去，而給與寫實的動物之印象。而所謂動物形亦決不為立體的肉體之表現。由此觀之，此等怪獸形有二事極堪注意，即第一，以寫實性為動物之表現，第二，此等寫實形，非為彫刻的，而為影繪的表現，即非浮彫的而為平面的也。

其次，怪獸文之性質，為影繪的平面的，非空間的是也。若用考古學上的熟習言法，則為拓影的也。被描寫之物象從其背面，自其輪廓浮上。平面背面與平的物象二層的互為分離。怪獸跳躍而上，但非自大地及空間關係跳躍而上。譬如在暗闇中照出路傍之石佛，從前後左右之暗闇處分離者也。此之謂原質的個體性也。

以上吾人以秦鏡鏡背之動物圖像的影繪性、平面性說來，秦鏡也者，其地文樣實有考察之必要也。第一，其文樣為幾何學的文樣，即常見於周器中之雷文也。第二，與前述之浮文樣的動物形無交涉無關係也。第三，文樣之構成，為織物作風之平面的無限擴大性也。其中所謂文樣構成之無限擴大性，尤為秦鏡及秦銅器最顯著之特徵。結果，我所感受的印象，圓鏡之中心的統一性甚受損失。其無限擴大性，與其動物之圓周的S字形之律動性(rhythm)，矛盾並存者也。

地文與浮文樣之如斯關係，以之與周式樣之饗養文化比較，則甚有興味也。周器所裝飾，可稱為文樣的要素之夔龍文虺龍文等，已化於左右均齊的饗養文之中，即所謂獸面化，——單取其二眼——以為主眼。周式樣之原理，最後則為勻稱、調和的(symmetry)也。故從周銅器之浮文樣與地文樣之關係見之，儼然有統一性的相互之關係，決不如秦鏡之矛盾的對立也。即作為地文樣之雷文、渦文等，沿浮彫文樣(饗養文)之輪廓，先起運線，而其筆線對於作為饗養文之筆線為對照的細線。兩者之間，有主從的緊密也。

雖然，如前所述地文樣之無限擴大性，實為一般的秦式樣之特色。元來若從銅器上以窺秦式樣之生起，當先舉周式浮文樣(饗養文)接近於地文樣者，即饗養文平面化一點也。換言之：周式之浮文樣是浮出的，而其饗養文有統一的威嚴。若此浮文樣漸漸平面化，而其統一作用力漸漸消失，祇存視覺的平面性，便成為秦式樣之一側面也。抑有進者，虺龍文之平面的複雜的蔓絡業已出現，而其傾向益益強也。此蔓絡即所謂複合虺龍文，正是無限擴大性之最普通

之形式，即秦式樣最顯著之點也。大別言之，周式與秦式不同之處，可云對於觸覺的，象徵的，而為視覺的，裝飾的也。秦式銅器之形式，可以秦鏡為其式樣之代表。

這一大段話，是長廣氏說「秦式」銅器與周式不同的地方。他又說：

自此以後，新的浮文樣又起，其躍動性，其手法的影繪性，尤特殊者如見於附圖之怪獸形的寫實性，與附於S字形式之律動性等，固然與周式樣隔絕，而又比之秦式銅器，有一段新的展開。蓋漢式樣者，以漢鏡為其流布之作風(type)者也。又一方，依據其浮文樣與地文之矛盾的對立之反撥的彈性，煽動其浮文樣自身之躍動性更為激烈。而此性祇在漢鏡中見之。

自此以往，此種躍動開始矣。獸眼的凝視力次第失去，反之而狂跳之獸自此飛出矣。動物崇拜之形式，自此展開，其故何哉？蓋從西方所受大小種種文化的影響，此種現象的背景，其徑路已捕捉漢族之心。此事在我尚祇是疑問，有待於將來考古學上之證明也。……總之：周末漢初之動的問題，即所謂秦式，已完全認識。而漢式樣一問題，則缺乏重要點，須待將來解決。此時我輩對部分的分野，尚不得云不滿足。

漢式樣的特色，可見者有二。其一為有明確的觸覺的所纏繞之影繪性。即前文所述之原質的個體性。第三，為醞釀於相互關係之律動性。……換言之，漢式樣者，以流布之作風言，即秦鏡之純化而有統一性者也。

這是長廣氏說明秦式銅器與漢式不同的地方。由此觀之，長廣氏於秦式銅器的主張，較之濱田氏不相上下。謂對於「秦式」銅器，已完全認識；而

於秦式所以成立之故，秦式與周式所以不同，又與漢式所以不同，分辦入微。其理論，較濱田氏更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蓋在王涅克濱田耕作兩氏之後，以這一說為最有力量。此外則日本水野清一亦主「秦式」銅器之說，他在支那古銅容器ノ一考察（構築的ナ部分ト裝飾的ナ部分）一文裏大畧說道：

但是代表有秩序的禮的生活之周銅容器，含有自其本身展開的二種端緒：一為饕餮文的形式，而另一則為饕餮性者。而新的秦銅的式樣，從此發見了。其初饕餮文於根本上只是借用現實動物的形體。漸漸饕餮形的擴充，一面不免饕餮獸化了。（如附圖二）然銅容器的全體不免有不安定之感，結果這種自由的寫實的姿體動物化達於頂點了。這是秦銅器的特徵之一。又周銅器以「明德」為主，故伐國收其重器，分國則班以重器，這無非是「明德」的表徵。及秦的政治為離德的政治力，即所謂霸道，以兵力為主，故促進禮器的移動的原動力出現了。從而失去德力的禮器的贈賜，除貨財的贈答以外，不用何物。宗器者遂從寶器而流為經濟的貨財的性質了。其結果，秦銅器的式樣發生。新式樣即據周銅器崩壞的原理而有顯著的方向。即饕餮文的動物化，感覺化，禮器的貨財化，禮的客觀化，構成上的動搖為多樣的。及至秦銅的多樣性到來，裝飾的與構築的自由併存關係，從緊密合成的周銅變為分離的秦銅，這是一般的特徵。周銅的基本構成的緊密合成被破壞了，於是秦銅容器遂為構築的機能的器形，與非構築的非機能的裝飾便湊集起來了。

這種「秦式」銅器的理論，是深信了濱田、長廣兩氏之說以後創出來的。

四、最近發見的新事實

元來殷周古器物出土，在近二十年來，大者已有五次，而王涅克氏所假定之材料，僅祇在山西歸化一處。劉節楚器考釋緒言說道：

就其役之卓卓大者而言，凡有五次。民國十二年秋，河南新鄭所出古器，一也；同年山西歸化李峪村所出古器，二也；十八年洛陽韓君故墓所出古器，三也；同年秦中寶雞縣門鷄臺所出古器，四也；及二十二年夏間安徽壽縣所出楚器，五也。……歸化所得諸器大部流往外國，其在國內者，亦秘不示人。吾人唯於日人梅原末治氏，法人狄柴克氏，英人西崙氏諸人所著書中見其涯畧焉。

案日人梅原末治所著：支那古銅精華及歐美ニ於ケル支那古鏡二書，其中均有論及歸化出土及所謂秦器者。狄柴克氏 H. D. Ardenne de Tizac 所著書名中國古典美術 L'Art Chinois Classique，其第八章專論秦器。西崙氏 Oswald Siren 所著書名中國古代美術史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其第一冊最後一章論及歸化出土諸器。但在國內尙無專書論及此事。而王涅克在歸化所得各器物，即捆載而歸巴黎，旋即分售各國，現時英，法，德各國公私分藏，將來恐亦永無可靠的報告書。秦中寶雞縣所出諸器，盜掘匪黨竊現為官方所獲，器物散入私家，間有流往外國，今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器物目錄及照相本一冊，其他亦無著錄。新鄭出土，有馬衡的新土古物調查記，關百益的新鄭古器圖錄，靳雲鶚的新鄭出土古器圖志；洛陽韓墓出土，有懷履光 (Bishop W. White) 氏的洛陽故城墓考 Tombs of Old Loyang，徐中舒的厲氏編鐘圖釋等，殘缺不完之報告書可資研究。壽縣則先後出土二次，除十年前所出物為瑞典人加爾白克 O. Karlbeck 所得分售歐美各地外，其二十二年所出土者，大部分尙留在我國，而材料亦最為新鮮。郭沫若在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一文云：

安徽壽縣淮河流域附近，於十一、二年前曾有大批銅器出土，大抵為時駐留於蚌埠之工程師瑞典人加爾白克氏所得，由其手分售歐美各地，遂喧傳于世。唯時所得者多零碎之車馬飾具及帶鈎銅鏡之屬，其較大者僅有鑄鼎壺數事（現存瑞京之東亞蒐集部）。一九二六年加氏曾有文發表，論其中之銅鏡（Notes on Some Early Chinese Bronze Mirror, C. J. S. A. Jan, 1926）。……然自去年春間，於該縣之朱家集李三孤堆復有大批古物出土，據報所載，云土人鳩工六十餘人，掘深五六丈，長可二丈，得見古銅器多種，四週皆架以大木，木料堅緻，排列數層，約有七八房間之大。其中有大鼎重七百餘斤，鼎蓋皆雕鏤有文，花紋極古，又有大小銅鍋，若鑊，若釜，以及盤，匜，尊，簠，壺，匱之屬。玉器則有珪，璧，環，玦，球琳，琅玕。武器則有刀，劍，戈，矛，兜鍪，矢鏃各件。石器則有盤龍形，蟠螭形，並有石牛八座，刻鏤極精。此外尚有雜器多件，為三代廟堂之祭器，名稱多難定。總計所出，大小諸件在八百以上云。

出土之時，雖不免畧有散落，未幾即經當地人士封存於縣教育會，其後即移度安徽省立圖書館中，計有大小共七百餘件。最近因選擇參加英國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吾友容希白唐立庵曾親至該館審選，據云：諸銅器質料花紋多粗惡，確為戰國晚年銅器末期之物，作工不及新鄭出土，惟式樣之新奇，實足訝為壯觀云云。此外散落者，幸流出尙少。劉節楚器考釋緒言說：

其因土人竊賣，流落於外者，平，津，京，滬，皆有之。在滬而歸廬江劉氏善齋者，有曾姬無卣壺二，楚勺二，具見善齋吉金圖錄。在京者楚王畬肖爵鼎一，胡光燁氏曾為考釋，其器今不知在何許。又

一部流落天津者，歸李氏所藏，計鼎一，簋二，豆二，勺二，匜一，凡十件(?)。其在北平者，計罍一，盤一，劍一，簋三，豆二，勺二，凡十件。其中一勺，曾歸海城子省吾氏，著錄于其所著雙劍詒吉金圖錄中，今轉歸東莞容氏頌齋所藏。此外九件，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二千零三十元購其七件於尊古齋黃百川氏之手。其餘一勺一簋，黃氏以贈該會，今皆寄存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部，即本書所錄九器是也。

據劉氏所說，壽縣楚器之散落於平，津，京，滬，而藏家可稽的，已有三十四件。合之安徽省立圖書館所藏，差足八百件之數，較之近二十年來之其他五次出土，流出國外者，實居最少數。

我們據這次壽縣出土，以比較歸化出土中而國外學者所稱秦式銅器者，其新事實立可發見，而秦式銅器之說可得推翻了。

五、所謂『秦式』銅器說的不能成立

『秦式』銅器說創自無識的古董商之口，其說原無根據，在學人之間，首先懷疑者為日本考古家梅原末治氏。他在日本三田史學會出版的史學十卷三號裏有論所謂秦銅器一文，對於所謂『秦式』銅器已懷存疑態度，謂當稱為『戰國式』，惟態度尙不鮮明。其後在歐美ニ於ケル支那古鏡一書第五章所謂秦鏡ノ性質ト支那鏡ノ起源中說得更為堅決。他說：

通觀是等，已有利用此等資料考察秦鏡文樣的特質之長廣敏雄氏舉例說明，其間自存規矩，氏已用近式輕妙言辭，說明其性質。……於是此等所謂秦鏡者，不及考察實在年代的順序，而遽下秦鏡之名，然亦行之不廣也。蓋其初出於支那古美術商之口，而學者

之間，不過襲其唾餘耳。除加爾白克工程師從其出土地的沿革器加考察，而西崙博士承襲其說以外，其餘諸子於所謂秦鏡之故，殆無論究。今從支那考古學的現狀以求所謂範疇 (found) 上立論的根據，其事有所不可能。幸而加爾白克氏所示的資料尙存，寧可舍彼而就此也。然而確實的證據尙嫌不足。若從可以代此的型式學上考察，乃至其他事象，又不能提供傍證。所以波士頓 (Boston) 博物館富田幸次郎氏乃生懷疑論，這可云是當然的。蓋以上記載所謂秦鏡之諸形式，在日鮮考古學上所示之事實，並從種種方面型式學的研究以歸納所認定為前漢時代的諸鏡之樣式，以之對比，其間頗有相同之處。若得以此推定蟠螭鏡之關係，在前漢鏡之先，亦得成立秦鏡說。今更進而考察其年代，或可與以確實性。……此處所謂秦銅器者，初舉河南省新鄭縣出土的一群遺物所示的事實。從種種之點考察，認為周漢過渡期之形式。推得如上之合理的鏡的年代。稍為見於漢鏡之均勢的，自由布置的，其間手法上，可說畧有異同。更進而觀察此問題所謂秦鏡的圖樣之全體，從以最簡單地文埋於面上的式樣，以至加入其他分子，而為二層的圖樣之類，以裝飾於圖的空間之構圖為原始的，為缺乏統一性的。對此，其次之蟠螭鏡遂可云有一段之進展。而地文的面影，前漢時代諸鏡的構圖太整美化了。其間確有相當的展開。解為兩者同時並存，距離事實尙遠。即以所謂秦鏡之類，在從來所知前漢鏡之先預立一羣，此種見解，從現在支那考古學上的知識乃至一般的型式學的考察，可以支持。以上所注記，有為如右之趨向，此類之鏡，不得為秦代之鏡。如上所述，所謂秦鏡者，在圖樣之上，有種種類別。其中從形式上考得如右之前後系統觀，

限於極短促之秦代，其為不當，不必多言。加爾白克氏所搜集之品類，多為淮河流域之物，即信為楚國所據之地，而已故特律布涅(Jorg Trubner)博士所獲所謂秦鏡之類，皆為河南省洛陽附近發見之物，今以之只與『秦』結合，稱為秦地方的式樣，殊不穩當。而在前者加爾白克氏的聚集中，可云含有所謂秦鏡種種形式之蟠螭鏡，可云有一番顯著之形式者，事實上帶有一種古調的形式，因而其實在年代可得上溯，自前漢鏡盛行以前上溯至戰國時期，此等通行之實在年代，得以想定。彼饗養文鏡與河北省易州燕下都出土之瓦當文的圖樣相合。從此推測之年代，不致誤排。而所謂秦銅器的盛行年代，可以推定，同時，兩者的手法相合，不是偶然性可知也。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梅原氏否認『秦式』銅器的態度底堅決與理論底充足了。他又於近人謂『秦式』銅器乃受斯基脫文化影響之說，加以辨正。他說：

雖然，因此銅製圓鏡的起源，除支那以外，應考其所導出。蓋在昔一部分人士所說其形式基於所謂斯基脫銅鏡之說，不得不從新加以考量。……此等之鏡，其形畧小，這一點已如上述。同時又甚似從同地域向西方擴充所謂民族大遷移時代之鏡。殆全部為青銅質的素文鏡，這點又呈別個之趣。有與伴同出品確示不同之時代較古之說。而這時代，相當於所謂斯基脫文化的盛時。於從其文物一部的遺蹟的實際考知，近時又從其文化東漸種種之點考之，互為表裏，在有紐的之該素文的小鏡中，尋求支那銅形式上的母型，鑑於上述支那古鏡所示的事實，可有一新容認之一有力見解。這見解可認的應特別注意之點，比之上述斯基脫系小鏡，從上述支那鏡的開始，

卽作白銅質而極優異，此亦自是事實。因思所謂三代，支那的鑄銅技術異常發達。既然，在一部分所謂三代銅器之中是白銅質，自實物上見之，則適用照面之鏡，自爲所產無疑也。而支那古鏡對於斯基脫系小鏡，可以認爲有一特異性了。

以上從所謂秦鏡爲發足點，並及支那鏡的起源，與近東金屬鏡之關係，一一推測。此有興味的一問題，正待南俄西伯利亞等地的材料的記述以考明其性質。近擬蒐集是等材料而整理之，以改爲詳說。

他又在北支那發見一種銅容器，其性質一文的結論說道：

從以上諸點觀之，對於這種銅器在北支那存在，係經過西伯利亞的西方文化向東方可及的考察有一重要意味是不能相信的。這類在北支那的，與支那自來的古銅器並存的事實，而又以支那古銅器與斯基脫文化相結合而說明其性質，這一部分的西歐學者所說，殊不確當。……如上記云云，於這可求斯基脫文化的本源的銅器，在北支那發見了，與某種在技術上較優的漢銅器併存狀態不明，從而與漢銅器年代上的對立，上溯的時期遂特殊的發展，以所謂三代銅器附隨斯基脫文化，這到底是不能的。

梅原氏治學的認真，態度的審慎如此，也不得不斷定我國古鏡與斯基脫系小鏡有特異之點，不可混爲一談，則吾國學人可以恍然悟了。

其次懷疑「秦式」銅器說不能成立者爲吾國郭沫若氏。他在屬氏鐘補遺一文裏說道：

又此器乃周安王二十二年之器，在戰國初年，而花紋亦正是所謂「秦式」，此亦足證「秦式」之非秦式矣。此等形式之器之較古者多出於燕晉之地，謂曾受斯基泰 (Scythia) 藝術之影響，庸有可能，然

可斷定出於秦地或確為秦器者迄未一見。則傳播此影響者亦不得屬之秦人。外來影響之說如果確，則為之媒介者或即鮮虞燕晉人，而以鮮虞為尤有資格。鮮虞古稱「白狄別種」，恐有西方人之混血亦未可知，將來北部發掘盛行，由人骨之測量比較，或能得其究竟也。

又在扶氏壺一文說道：

前有嵌石之陳駢壺，已由余攷知為齊襄王五年齊人攻破燕軍時所得之燕器，今又有此同鑲嵌與飛獸文樣之扶氏壺，乃春秋末年為燕人所得之鮮虞器；近年河南洛陽韓墓所出之厲氏鐘，乃韓烈侯時器；安徽壽縣所出之楚王鼎，乃楚幽王之器；此外善齋所藏之「取它人之善鼎」，取聊省，乃孔子所生地之聊氏色；^{善二}「東周左自壺」乃周考王末年河南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之東周；^{善三}此等器物之花紋形制均為一系，而其絕對年代或相對年代均可推致。故此等器制似直可定為「周末式」也。

又在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一文中論善齋吉金錄之曾姬無卣壺二器，說道：

此二壺^{善齋器錄}，據著錄者云「出於皖之壽州」，則是與楚王鼎諸器乃同出于一地者。然此器之作，與楚王鼎不得同時，據史記，幽王在位僅十年，考烈王亦只二十五年，此言「王廿又六年」，用知必在考烈以前。器之形制紋樣既與新鄭壺相似^{新鄭器乃鄭子嬰齊之殉葬品}，或者乃春秋中葉楚之成王^{四十六年}或共王^{三十三年}時器也。楚王鼎諸器，其紋樣亦即所謂「秦式」，然與此二壺之紋樣顯有一脈相承之系統。使所謂「秦式」器果係受外來藝術之影響者，其影響之輸入或當在春秋初年矣。

郭氏雖對於斯基脫文化影響之說尚懷存疑態度，未敢公然加以否認，然

於「秦式」銅器之說，則決然謂非秦時之器，而假定爲「周末式」了。雖然，郭氏身居海外，尙未得觀壽縣此次出土楚器之詳，故尙嫌未能暢論。楚器異同之制，最近劉節在楚器圖釋第四章形制與紋樣裏卽暢言之，蓋卽根據新發見的事實而推翻「秦式」銅器者也。劉氏說：

楚器年代適當戰國之末葉，其形制與紋樣卽可作該時代之標準。以此爲的，而與新鄭，洛陽，歸化，三次所出之銅器相較，則其形制與紋樣之淵源可歷數而得也。近年以來，西洋學者昌言秦式。又謂秦式者，乃受斯克坦（斯基泰）文化之影響。甚至附會俗說，謂歸化所出諸器，乃秦始皇二十八年巡狩時所遺留之物。吾國學者數典忘祖，遽信爲真，又從而鼓吹之，於是秦器之名，遂嘩於世。今得楚器爲研究之中心，則所有疑難皆可渙然冰釋矣。今分形制與紋樣兩項以探討上述四次出土諸器異同之點如次：

楚器之鼎，其形制有四種。其一，鑄鼎，……其制與歸化所出之鼎……洛陽韓墓之……鼎，相似。新鄭所出鼎，其制甚大，與楚鼎之大者相彷彿，……就其大體觀之，與虢文公鼎相同。其二，日鈿鼎，……其制蓋從匜變化而來，……然此風鄭國已有，鄭叔句父鼎其一例也。其三，說者謂虺鼎，……與紐約 Metropolitan 博物院所藏一豆相同，皆戰國晚期之器。其四，說者謂之小口鼎，……此器與渾源所出之鼎有相似之點。……渾源所出者，時代確在其前。

鼎之外，楚器中有毀有簠。而毀之形制最爲別緻。諸役之中未有此體也。……鄭器毀有二種，無足者上承周制，有足者下開戰國之風，則鄭器之時代於諸役爲最早者矣。

簠之形制，楚器與鄭器亦相同。……

壺之形制，楚器與鄭器亦極相似。……楚鄭之風相近，於此又得一證矣。……

盤之制，楚器與古相承，並無特異之點。……

豆之制，楚器鄭器亦相似。……而新鄭所出之豆稍矮，亦純素無花，又楚鄭作風相同之一證也。

諸器之中，其關鍵尤大者，厥為銅鏡。西洋學者所謂秦鏡，大部皆出壽州。鄭、洛之間，並有出土者。而無秦匄之物。其非秦鏡，學者已辨之。就其中有字者考之，乃整齊挺拔之小篆。此斯翁以後之字體，頗疑西漢之物，而洛陽韓墓中亦有出土。就其體制而言，又較早。總之，壽州洛陽間所出之鏡，與漢鏡異撰。而其時代自戰國中葉以至西漢初年為限，其不能名之為秦鏡，則甚顯著也。

楚器紋樣與諸役所出各器相同者亦甚多。然諸役之中，除新鄭所出較早者外，吾國古器中所常見之饗養紋反而稀見，此為晚周銅器作風之一特點。麗光鐘出於韓墓，其紋樣亦最生動有力，而其中具有饗養紋。此可證該鐘尚守成周舊法，非晚期之器也。楚器中無饗養紋樣，而最普遍者則為蟠螭紋，蟠雲紋，其次則蟠鳳紋，蟠夔紋。吾人今日以楚器為中心而研究此四種花紋衍變之跡，則所謂秦器紋樣乃受斯克坦文化之影響者，其疑惑可以渙然冰釋矣。日本濱田耕作氏謂秦器中作變形雷紋者，即吾國學者所謂蟠螭紋也。此項紋樣其簡單組織，則從蟠虺紋而來。新鄭出土銅器大都作蟠虺紋，渾源所出者亦有同樣之花紋，然同地所出之物中亦有較繁複者，即所謂蟠螭紋矣。其出於歸化之鼎為代表作，確類螭蟲蟠曲之狀。然至

楚器時代則更複雜，由拳曲之螭身而變為兩正方形套結之狀。螭身初由蟠虺紋之一線而來，自是此線由一畫而變為雙鈎，此雙鈎之螭身中更添入雲紋之小圈，由一小圈更變為S形之數小圈繚繞而成。此蟠螭紋由新鄭器至於壽州器變遷經過之素描也。

更進而論蟠雲紋，其較早者如虢文公鼎，筆力極渾厚，稍晚為新鄭所出之方甗，更晚為韓墓所出之壺；至於楚篋之器沿，其制則更形複雜。雲紋鈎勒帶有秀勁之氣，雖遠勝虢鼎，而未變其法度，亦可見楚人之風淵源虢鄭，到處流露而不自覺也。

蟠夔之紋，鄭人亦已有之。鄭咸句文鼎其腹間有花紋一道，與西清古鑑卷七所著錄之夔紋鼎極相似。唯此鼎比較複雜，夔身雙鈎，其中亦添入雲紋細花，此鼎亦六國時物，其衍變之階段雖未能盡得，然畜志罍鼎之紋樣則確從其制而來，每為顯著之事實。……凡此種種，皆可證楚器之紋樣，於先秦諸器中自有淵源可尋，未可以外來影響一語而搪塞其責也。

就劉氏以這次出土的楚器為中心，從其形制、紋樣研究的結果，晚周時代流行於歸化，渾源，新鄭，洛陽，壽州，各地之器，自有淵源遺變之跡可尋，當然不得名為「秦式」，且亦非受斯基脫文化所影響而來的了。

查Scythia舊譯為西徐亞，係指黑海北方的草原及鹹海附近或亞細亞北部及中部的古地域而言，為印歐語系諸民族的居地，即今日南俄及高加索諸地。日人則譯為スキタ人，近人重譯則或為斯基脫，或為斯基泰，或為斯克蘭。其文化的發生，雖甚久遠；然其本土文化的發揚，確在腓尼基已握地中海貿易之權，希臘人南下，邁錫尼 Mycenace 時代青銅器文化盛行之時，大約為公元前一千年，我國周穆王之世。因當時海上交

通已有進步，腓尼基商人往來其間，東方諸文明國，與克利地島上特賴城 (Troy)，希臘的邁錫尼，尼羅河的埃及已有密接關係，東方人與彼等接觸的機會愈多，因而互為影響。今日考古家所發掘得這時期的陶器青銅器的紋飾，確有作狩獵形的。西洋史家至有稱這時期為『希臘西徐亞』文化。其後至公元前五六世紀以後至前二三世紀之間，乃有西徐亞式銅器傳至匈牙利一帶。這是就今日匈牙利發見諸例的遺品的年代以觀，為歐洲考古學家所考證出來的。傳至歐洲之難已如此，然則在這時東西交通之路未開，西徐亞文化如何可以傳至我國？除非我們承認穆天子傳等偽書，並證明周穆王確曾乘了八駿馬飛跑至波斯或土耳其一帶，我們怎能說中國已受到了影響。據日本史學專家原隨園所說，謂近世考古學者就印度所發現的古代貨幣來研究，西徐亞的文化傳入印度，大約在二世紀之初（一三五年頃？），迦膩色迦王 (Kaniska) 之時。（詳見印度文化、希臘及西南亞細亞、文化、交流一書）。然則傳至我國，當又在其後。即退一步說，在春秋初年或戰國初期已有交通，如郭沫若氏所言，則郭氏謂傳布的媒介人不得屬之秦人，何得謂之『秦式』？况我們今日所見的兩方面的銅器，一為青銅，一為白銅，一大，一小，已如梅原氏所云云，實亦不得硬說其同出一源。反之，若謂為這種銅器式樣為在中國自由衍度，如劉節氏所考證，淵源均可尋溯指證，事實具在，大可覆按。故『秦式』之說，外來文化所影響，均不足信。矧『西洋學者所謂秦鏡，大部皆出壽州，鄭，洛之間，亦有出土者。而竟無秦甸之物』。則昌言『秦式』，寧不可笑？！然則長廣水野二氏之說，確能舉出周式銅器以後，如附圖所見，鏡裏的獸紋活潑，紛亂而不整齊；而饕餮文器則動物化達於極點。這種又當怎樣解釋？以我的意見看來，這只是從『周末式』或『戰國式』發展到『漢式』

的一種過程，非關外來文化所影響，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即如水野所謂解說，以“明德”與“霸道”為其分野，這正是說明這個變化過程頂好的注腳。漢承秦舊，漢式樣既為秦式樣的純化，則秦式樣又實為戰國式樣風行以後的混合化。故「秦式」銅器之說，萬無可以相信之理。

到了這裏，我們應該替它重定一個名稱，就是叫做「戰國式」。羅振玉氏貞松堂集古遺文於這一類的銅器，屢有「戰國時器」之說。郭氏在陳駢壺文中云：「蓋戰國時七國之交涉繁，故於器制呈現一共同色彩，則此等器制似可直稱之為「戰國式」也」。是「戰國式」一詞，近人經已習用。而證之劉節氏所研究，這一類的銅器又散布楚，韓，鄭，魏諸國，雖其時代不能齊同，而要以戰國時為多。若以「周末式」名之，則恐不能得清晰的界限與觀念。

六、論文化多元與交流作用

文化交流作用，當然是常有的事。但是應當有千真萬確的真憑實據，不可隨便附會的。我記得瑞典的大考古家孟德魯斯 (Gustaf Osear Augustin Montelius) 的考古學研究法裏的「型式學的研究」(Typologische Methode) 所注重，只可比較得各各的前後順序的「組列」(Serie)，為各各器物作成的年代平行而進，因之假定其各各的相當年代，以這種組列的平行性 (Parallelismus) 再定其何者為同時代之物而已。萬不能因偶見其有一二相同或類似之點，硬謂其同出一個母型。這是我們的桌上考古家應該負的責任。

大抵人類的各種文明，決不是一元的而為多元的。散居各地老死不相往來的各民族，受了天然環境的支配，進步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自然

各有各的創造，其經過的階段，因為智識的進展的力所推蕩，自然也由石器而銅器而鐵器的歷程相同，同時各時代的形制、紋樣的蠅變情形也相似，我們千萬不可以這一點相同或類似的地方，便附會其同出一母型，除非是有了互相往來的交通，和完全同型的真憑實據。所以早年盛唱的我國人種西來說，現在已打得粉碎，就是爲着它是不合科學的方法而是由於附會的。不但如此，即使在我們國內，在古昔不相往來的時候，各事物的發生也有先有後，有這裏早已發明，而那裏又有人重爲發明，不得謂這裏一個人發明鑿井的方法，而那裏的人非先到過這裏便也不能鑿井的。如果不信這話，請先熟讀世本一類的書，便知其詳。須知古代交通的情形與現代絕然不同，以今日之事推測古昔之事，這是與漢儒以漢制解經全沒兩樣。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寫成於滬上四部書齋。